

贵州遵义:红色基因助推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

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



仲夏的贵州遵义，万木葱茏。

6月21日，在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的遵义会议会址，不时有游客在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匾额前合影留念。

在修葺一新的遵义会议陈列馆内，不少游客跟随讲解员的脚步，边看边想。在反映长征历程的大型浮雕前，在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前，在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前，在一篇篇泛黄的革命文献前，人们驻足沉思。

已经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10年的陈松告诉《经济日报》记者，自2008年免费向公众开放以来，每年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的人数不断上升；2015年，遵义会议纪念馆共接待海内外观众401.68万人次。

来自贵阳的王先生曾多次参观遵义会议会址，他说：“每次参观遵义会议会址都是一次党性教育，每次回顾我们党成长壮大的艰辛历程，都能给自己的思想除尘，给精神补钙。”

沿着木质楼梯，登上那栋熟悉的二层小楼，在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，18张藤木椅子安静地围着一张赭色长桌，仿佛那场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

重要会议刚刚结束。

红军长征途中，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。经过激烈争论，会议结束了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，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革命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。

此后，中国工农红军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，先后血战娄山关、四渡赤水，在黔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火种。

如今，当年留下的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，成为推动该市建设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强大动力。

“对于遵义而言，传承好红色文化是使命责任，坚定不移地推动绿色发展是战略选择。”贵州省委常委、遵义市委书记王晓光告诉记者。

作为红色圣地，遵义始终把传承红色文化作为使命担当，把红色文化全面融入干部教育培训、决战脱贫攻坚、发展文化旅游等工作中，既坚定了人民团结奋斗奔小康的信心决心，又激发了群众干事创业的激情，为科学发展、同步小康提供了不竭动力。

近年来，遵义斥资20多亿元，开发13个红色旅游项目，打造了“四区一城三镇两村”红色旅游精品景区（点），同时保护开发了遵义会议纪念馆、红花岗红军烈士陵园、娄山关战斗遗址、四渡赤水

纪念地等一批红色资源，红色圣地的文化底色更加浓郁。

目前，遵义共有国家3A级以上红色旅游景区5个。红色旅游已经成为该市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遵义共接待游客6200万人，实现旅游总收入547亿元，分别增长20%以上，其中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1946.6万人次，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7.7亿元，分别是“十一五”期末的2.69倍、2.51倍。

传承红色文化，关键在教育、在学习。

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中，遵义市在做好“三会一课”的基础上，集中组织开展“上一堂革命教育课、参观一批革命旧居旧址、在革命遗址前宣誓、过一次红色组织生活、写一篇感悟文章”的“五个一”体验活动，让党员干部感受红色精神，接受红色教育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推动绿色发展是遵义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选择。

不要污染的GDP。因“四渡赤水”而闻名天下的赤水河，有“生态河”“美景河”“美酒河”和“英雄河”的美誉。为保护好这个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遵义市久久为功，深入推进赤水河流域生态文明制度改革试点，编制了《赤水河流域“四河四带”总体规划（2014—2020）》，划定了生态红线，加大环保执法力度，推进环境违法“零容

忍”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既在保护上给力，更在发展中减排。近年来，遵义市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城镇带、特色产业带、美丽乡村带、文化旅游带建设，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路子，增强了绿色遵义的自然底色。

传统产业加快转型。2015年，遵义以茶酒为代表的特色轻工业实现产值970亿元，能源及材料产业产值达到700亿元。

新兴产业加速突破。近年来，遵义加快发展电子信息、智能终端制造、新能源汽车、服务外包呼叫中心、大健康新医药等产业，先后引进了以晴、甲骨文、中兴通讯等大数据及关联优强企业。2015年，遵义2000座席的呼叫中心建成投入商业运营，信息产业规模突破600亿元。

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

“十三五”时期，我们要在传承好红色文化，推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，着力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，谱写经济社会发展新篇章。”王晓光表示。

根据规划，遵义一方面将抢抓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机遇，奋力融入长江经济带，深化与重庆的战略合作，推动实现交通基础设施、信息资源共享、政府整合资源、企业转型升级平台建设“四个互联互通”。同时，也积极谋划抢抓“一带一路”机遇，在长三角、珠三角产业转移中，全力引进适合其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的相关项目。

民族脊梁

把爱与忠诚融入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中

宋鱼水·

6月29日上午9时40分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3楼23法庭里，一位身着律师袍的原告代理律师满头大汗匆忙步入法庭，一边走一边向大家不停地点头致歉。

“别着急，准备好后开庭。”面对迟到的律师，审判长宋鱼水并没有责备，面带微笑，耐心等待。

这天，从9时40分到12时40分的3个小时里，身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的宋鱼水一共开了7个庭。等她换下法官袍准备去食堂吃饭时，距离法院午餐结束只剩下10分钟。

这是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所目睹的情景。

熟悉宋鱼水的人都知道，这些年宋鱼水获得的荣誉无数，身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、党的十八大代表、全国妇联副主席（兼）等多个职务，但她心里分量最重的还是“法官”这个头衔。

1989年，23岁的山东妹子宋鱼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，从做书记员开始了她27年的法院生涯，她先后历任海淀区法院民三庭副庭长、民五庭庭长、副院长，2014年4月，宋鱼水离开她工作了25年的海淀区法院，赴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。半年后，宋鱼水又来到新成立的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——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担任副院长。

“她常说，对于法官而言，案子永远摆在第一位。”和宋鱼水共事过的法官都记得她的座右铭。

吴园妹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最年轻的“80后”法官。在她眼里，宋鱼水一直坚守着“辨法析理，胜败皆服”的信念。每一次庭审结束后，她都会走下审判席，走到当事人中间，谈一谈对庭审中双方争议焦点的看法，原被告双方主张权利还需要哪些证据支持。

“当事人告抄袭，双方的剧本加起来可能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。无论多忙她都会看下来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真实感受作出判断。写判决书时，她的标准是改到不能再改才发给当事人。”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冯刚说。

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，院庭长带头办案是2014年建院伊始就规定的制度，宋鱼水在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上从未打过折扣。2015年全年，宋鱼水办理的案件数量超过了50件，相当于每四个工作日就要办结一起案件。

“碰到特别棘手的案子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先放一放，可宋院长却总是要先啃‘硬骨头’。她说，案子放得越久，当事人心里就越没底。”吴园妹告诉记者，即使已经是知识产权领域的审判专家，宋鱼水却始终保持一种学习的心态。遇到疑难案件，她会找到院里在该领域最优秀的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审理，在审判领域精益求精。

在海淀区法院工作期间，宋鱼水对于案件的严谨认真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法官。曾给宋鱼水做过助理的李颖回忆起十几年前的一起歌曲著作权案件，“撰写判决书时，她让我反复修改了四五次，指导我在裁判逻辑、行文措辞上反复修改推敲。最终，这个判决获得最高法院知识产权裁判文书评比一等奖”。

真水无香，大爱无痕。作为一名党员，宋鱼水把对党和人民的爱与忠诚融入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中去。对待审判业务她精益求精，在宋鱼水心中，当事人的分量总是最重。

一起案件中，原告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而且没请律师，带着对被告的情绪在法庭上将双方的纠葛从头到尾讲了个遍。宋鱼水不仅没有打断老人的话，在耐心地听完后，还结合法律规定归纳了老人讲话的要点，并向老人确认归纳得是否准确。

“案件是法官的立身之本。法官的职责不应该止于判决，而是以此为起点，引导社会树立规则意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尊重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，实现法官、律师和当事人的共同成长。”宋鱼水说。

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宿迟，是和宋鱼水一起创建知识产权法院的同事，对宋鱼水，他最深切的感觉是，不管多累、多难，受到怎样的委屈，总能平静、温和地面对，用理性与思考面对改革难题。“忠诚、干净、有担当、接地气，宋鱼水是名副其实的优秀共产党员。”

文/新华社记者 涂铭 熊琳
(新华社电)

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

金汤，天堑长江难以逾越。

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，蒋介石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。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100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弋，空军4个大队随时待命。

1948年12月30日，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——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。

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，被中央军委赋予了渡江战役的指挥权，第二、第三野战军各部队，组成了东、中、西3个突击集团。

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之后，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经下降至200余万人。蒋介石以为他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固若

1949年4月20日，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共双方拟定的《国内和平协定》，历时20天的和谈至此破裂。是日晚11时，解放军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下达了“开始渡江”的命令。

仅一个晚上，中集团30万大军就全部过江。而此时，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命令才通过收音机、报纸和传单，传遍长江前线的每一个阵地。

21日下午开始渡江的西集团，代价更小，第一批渡江的6个兵团仅损失10人。

是日晚，东集团发起冲击。仅用十几分钟，突击队就登上了南岸。而作战最紧

张之时，江阴要塞的3000余名国民党官兵突然起义。

几乎在江阴要塞起义的同时，林则徐侄孙、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，率领大小舰艇30余艘，在长江下游南京江北4公里处的笆斗山江面起义。

徐法全说，蒋介石集团曾经想依靠长江阻止我军前进。他们说：长江自古天险，曹操、苻坚都渡不过来，何况共产党？可我们只用4天，就让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成了“豆腐渣工程”，百万大军胜利渡江。”

文/新华社记者 凌军辉

(新华社电)

份”和“听民声、表民诉、解民困”等活动，在从严治党、构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、基层治理等方面开展创新实践。“社会问题逐渐增多，需要我们解答。”南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梁锐说。

30多年来，深圳从一个人口只有3万人的边陲小镇发展到人口过千万的现代大都市，深圳地区生产总值(GDP)也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.75万亿元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。

“深圳道路就是中国道路的缩影，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。”深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说。

“对于深圳来说，过去靠改革，当前、未来的发展也唯有靠改革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，我们要先从最核心、最要害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改起，先把这些问题突破了，深圳就会加速。”广东省委副书记、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说。

文/新华社记者 彭勇

(新华社电)

先行先试 勇立潮头

——记我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深圳经济特区

充分发挥前海国家战略平台的重要作用，将其打造成为新一轮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高地。”

30多年前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等经济特区建立。

深圳1980年获批建立经济特区，由此拉开了特区改革开放的大幕。

1981年，深圳蛇口工业区门口矗立起一块醒目的标语——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，震撼着世人。

——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；

——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，创造一天盖三层楼的奇迹；

——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，冻结原有级别、工资等级，实行聘用制；

——创办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、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、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……

无数“第一个”从特区涌出，像春雷一样惊动神州大地，带动神州大地。深圳以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气和魄力“杀出一条血路”，率先在全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自身也获得了快速发展。

深圳渔民村堪称特区的缩影。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的渔民村，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最早的“万元户村”，如今这个早已富裕起来的现代化社区，正在探索基层治理改革的道路上疾进。

近两年来，这个村所在南湖街道制定

基层党建质量认证体系，开展党员“亮身

私案件纠纷实行上门服务，勘查现场，征求当事人意见意向，协议(经济)兑现和回访，回复当事人到场。这套机制在化解矛盾、调解纠纷、指导调解中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。“有困难找老杨”，成了当地百姓的口头禅。

在杨光照的带领下，枫桥派出所、枫桥镇政府涌现了一批“老杨”式的优秀人民警察和优秀党员干部。2000年至今，枫桥派出所、枫桥镇政府先后共有55人次获评全国、全省先进个人。如今，每年有100多批次考察团来枫桥派出所学习“枫桥经验”。

“调解不是‘和稀泥’，它是一个学法、知法、守法、懂法的过程。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，通过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进行疏导教育，双方能接受的就及时制作好协议并签字生效，一步到位；如有一方一时无法接受的，就做好当事人的工作，并规劝引导当事人去法院走司法程序。”正是这样的工作理念，使杨光照和调解中心的工作业绩受到了各级政府和领导的肯定，赢得了辖区广大群众的信任和认可，老杨因此被当地群众誉为枫桥“清官”。



宋鱼水在工作(2011年12月20日摄)。

(新华社发)

枫桥“清官”杨光照

本报记者 韩秉志

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。

让群众满意，保社会稳定，这是老杨调解中心工作人员的准则。只要群众有需求，调解人员都真心相待，热情相帮。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公休日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只要群众需要，他们都随叫随到，从不推诿。民警张琼说：“老杨是我们的指路灯，我们有不明白的，拿不准的，常常向他请教。”

在与群众沟通时，老杨采取的方法是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；案件实例，比较疏导；依法遵章，法理疏导；以情感人，行动疏导。

“调解员要学会换位思考，调解时要人性化。一般当事人普遍存在的心理是，要讨一个说法，求一个公道，因此对受到侵害或受到委屈的要讲几句公道话和安慰话；对弱者的合法权益要保护，要理解群众心

理，会用群众语言。”老杨说。

都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但镇里的居民发生矛盾时，都乐意接受老杨的调解。老杨调解中心成立至今，先后受理各类(治安)纠纷1000余起，调解结案980余起，调解率98%以上，纠纷结案率100%，兑现各类经济损失赔偿(补偿)4800余万元，群众对调解中心的满意率达到100%。

调处过程是艰难的，但事结案了后，看到当事人的一张张笑脸，一面面锦旗，老杨他们很欣慰。

为方便群众、服务群众、提高调解工作效率，老杨带领几位工作人员总结推行了“四延伸、四服务、四到场”工作机制，即调解工作向社区、向企业、向校园、向农户延伸；对未成年人及中小学生矛盾纠纷和隐